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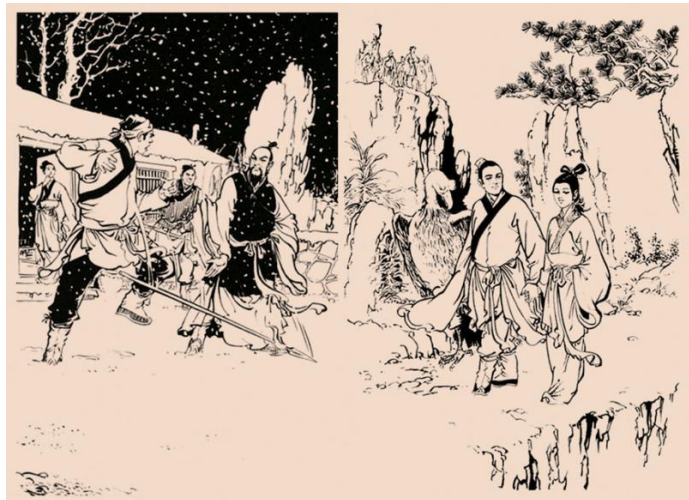
金庸笑傲中華傳奇 文化符號凝聚全球華人

邱立本

2018年11月11日 第32卷44期

http://www.yzkk.com/cfm/content_archive.cfm?id=1541042794188&docissue=2018-44

金庸作品是一道心靈橋樑，凝聚全球華人社會，衝破意識形態的圍牆，成為一個文化符號，演繹文化中華的傳奇。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蔣經國，無論是支持佔中的吳靄儀還是反對佔中的葉劉淑儀，無論是台灣獨派賴清德還是統派馬英九，都愛讀金庸小說。金庸作品成為兩岸三地及新加坡的教科書課文，讓被政治理念和地理距離所分割的全球華人，找到一個共同的文化平台，分享中華民族的軟實力。



金庸二零零六年在香港書展：首次在香港與讀者對話（圖：黎家駿）

《射鵰英雄傳》插畫

剛剛去世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（查良鏞）是一道心靈橋樑，連接在政治與地緣上被撕裂的全球華人社會。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蔣經國，無論是支持「佔中」的公民黨領袖吳靄儀還是反對「佔

中」的新民黨領袖葉劉淑儀，無論是台灣獨派賴清德還是支持終極統一的馬英九，都愛讀金庸作品。金庸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，凝聚全球華人社會，衝破了意識形態的圍牆，也穿越了地域上的限制。

這都因為金庸的作品滲透著「文化中華」的基因，將唐詩宋詞、經史子集、詩經易經、五行八卦等中華文化的特色，融會在作品的字裏行間，並且將故事的背景，設在真實歷史的背景，讓讀者浸淫在文化、歷史與文學的氛圍中，成為一本又一本的中華文化的啟蒙讀物。

事實上，從香港的初中到新加坡的中學華文課本，從中國大陸的高中到台灣的高中，中文教科書都有金庸的文章，讓新一代接觸金庸的江湖世界，裏面不僅有高度的娛樂性，也是人文啟蒙的精品。

儘管金庸作品提到不少「反清復明」、驅逐異族的故事，但金庸卻帶給讀者一個平衡與平和的史觀，超越「漢族沙文主義」，讓人重視中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事實。金庸作品的正派角色不少都是「非我族類」，如郭靖在大漠認識的蒙古勇士拖雷、神箭手哲別，或是《天龍八部》的蕭峰，本來就是契丹人，而與郭芙結婚的耶律齊等，也都是正直正派，有情有義。而漢族角色，則出現大奸大惡的左冷禪與小奸小壞的韋小寶，可見金庸的是非觀念不是以民族來劃線，而是回歸人性，以開放胸襟，跳出漢族中心主義的窠臼。

作品曾是兩岸禁書

金庸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在香港去世，蓋棺論定，全球華人社會赫然發現，金庸作品跨越政治疆界的文化啟示。金庸在五十年代在香港開始寫武俠小說，聲名鵲起，洛陽紙貴，但在香港以外的台海兩岸，卻都是禁書。台灣的黨政當局懷疑金庸是「中共的同路人」，對他的作品全面禁止。但在校園範圍，由於一些香港僑生「走私」帶入，都在朋友間瘋傳，連台灣大學外文系的文學教授夏濟安，都喜歡看金庸的小說。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，也問人借讀《射鵰英雄傳》。但畢竟一般書店買不到，坊間流行一些翻印本，但作者改為「荊翁」等，或是將書名也改變，如《射鵰英雄傳》改為《大漠英雄傳》，以掩人耳目，避開警備總部的檢查。

一直到了一九七三年，金庸訪問台灣，與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見面。當時準備接班的蔣經國見到金庸，大家用上海話交談，倍感親切，蔣經國說他看過金庸的小說，表示佩服。金庸回來香港後，寫了一篇《在台所見、所聞、所思》，對台灣頗有好評，也使得台灣的作品逐漸解禁。一些知識分子甚至成立「金學」研究組織，對作品人物性格加以深入研究，也對字裏行間的信息加以分析，媲美「紅學」研究。

曾與《大公報》筆戰

在中國大陸方面，金庸作品被禁是因為他是「階級敵人」；他不是「人民內部矛盾」，而是「敵我矛盾」。他在《明報》的社論，於一九六四年北京宣布原子彈發射成功後，獨持異議，認為「寧要褲子，不要核子」，批評中國當局忽視民生政策，與香港親北京媒體《大公報》掀起筆戰。一九六七年中國文革燃燒到香港，街上都是「同胞勿近」的炸彈或詐彈，危險重重。金庸被左派攻擊是「豺狼庸」，他一度離開香港，以策安全，前往新加坡，創辦《新明日報》，繼續每天寫武俠小說，但內容都在影射文革的荒謬。

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，鄧小平掌權，邀請金庸去北京訪問，鄧小平劈頭就和金庸說，看過他的武俠小說，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」，彼此都有惺惺相惜，相見恨晚之感。金庸的小說也逐漸在神州大地解禁，但開始時大都是盜版，讓大陸的書商大賺一把。後來大陸也開始拍金庸的電視劇，並且製作的資本越來越多，品質也越來越精良，成為一個「吸粉機」，讓無數的讀者都成為「金迷」，對金庸故事的人物熟如數家珍。

金庸作品風靡東南亞

而在東南亞，金庸作品成為文化中華的象徵，讓很多華人在追讀之餘，對中國歷史與神州大地的風情有更多認識。對很多的老一輩華人來說，金庸的世界更是撫慰文化鄉愁的載體，在刀光劍影的江湖裏，可以發現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之處，填補了他們在精神生活上的空虛。尤其金庸在六十年代曾經於新加坡創辦報紙，也在那兒寫了《笑傲江湖》等作品，也就是說，南洋的蕉風椰雨孕育了金庸重要作品，讓東南亞的華人覺得與有榮焉。

而從六十年代開始，台灣、香港的留學生在西方的異國土地上，往往是靠金庸的作品來慰藉無邊的鄉愁，他們在那些風雪的晚上，在孤獨難耐的時刻，都會拿起一本金庸小說，重看那些可能已經讀了多少次的章節，讓古典的想像世界，為當下現代的孤寂，帶來一種文化的滿足感。

越議員斥對手是岳不群

即使在其他的亞洲國家，金庸小說的翻譯本都是熱賣。如越南民眾對金庸作品都印象深刻，有一次國會開會辯論，有一位議員指責對手，衝口而出的是：「你就是岳不群」，全場轟動。這典故源於他們都看金庸作品，也反映金庸熱潮如何影響越南社會。

在台灣，金庸作品也是家喻戶曉。年前台北市議會質詢，綠營的市議員王世堅向以大砲質詢有名，他緊咬時任台北果菜市場總經理的韓國瑜，大罵他是「菜蟲」，貪污舞弊。但韓國瑜正色反駁。在一輪火藥味濃厚的交鋒後，韓國瑜突然冒出了一句「問世堅，情是何物」，立刻引起全場爆笑，連市長柯文哲也笑到彎下腰來。大家都知道這是金庸小說李莫愁的名句「問世間，情是何物」，而「世堅」與「世間」同音，一語雙關，讓本來緊繃的局面化解於無形。

這也是金庸作品所帶來的中華民族軟實力。它從娛樂性開始，暗藏不少中華文化的底蘊，凝聚全球華人社會，讓被意識形態和地理距離所分割的全球華人，找到一個共同的文化平台，彼此深入交流。金庸的作品，成為了一個文化符號，演繹文化中華的傳奇。■